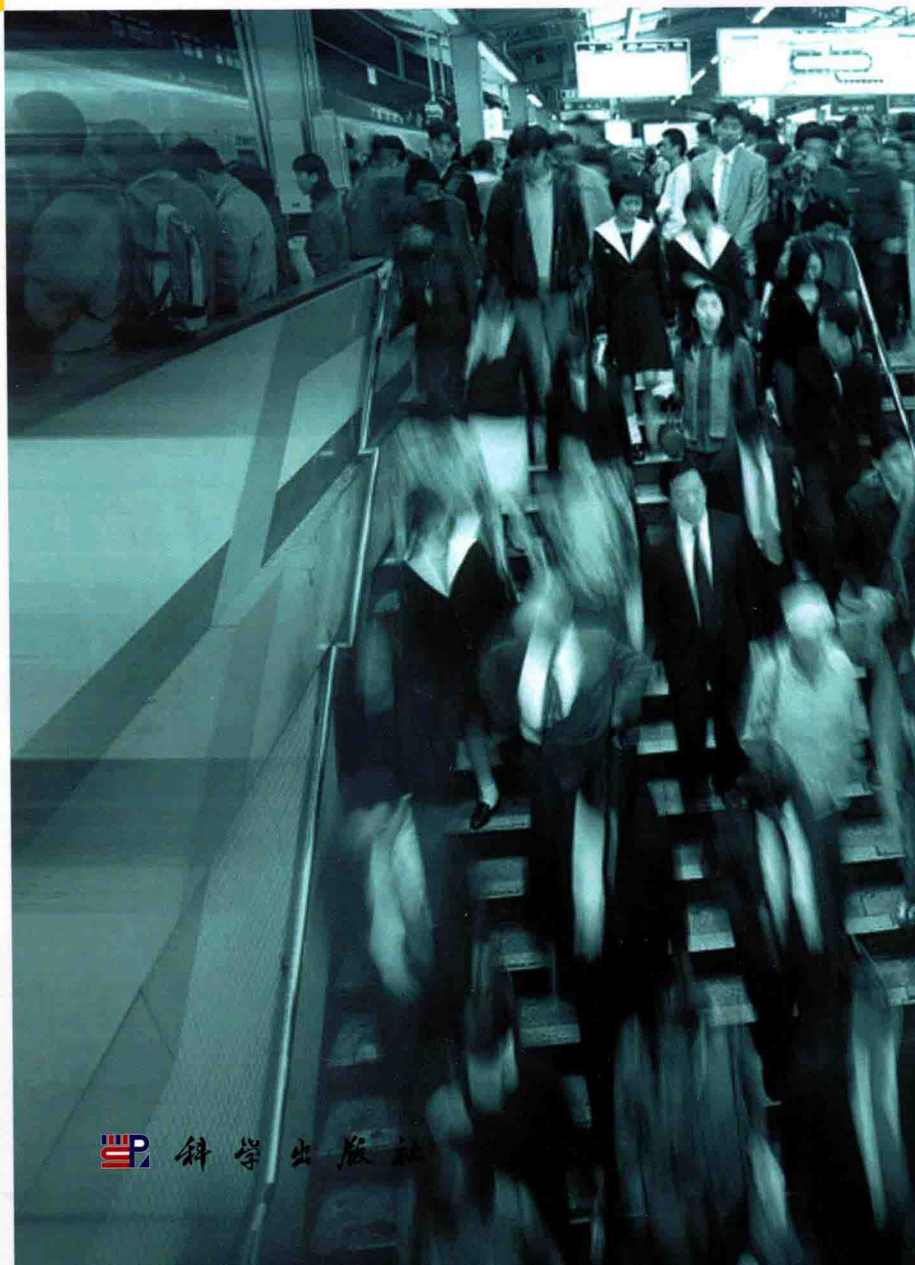


# 中国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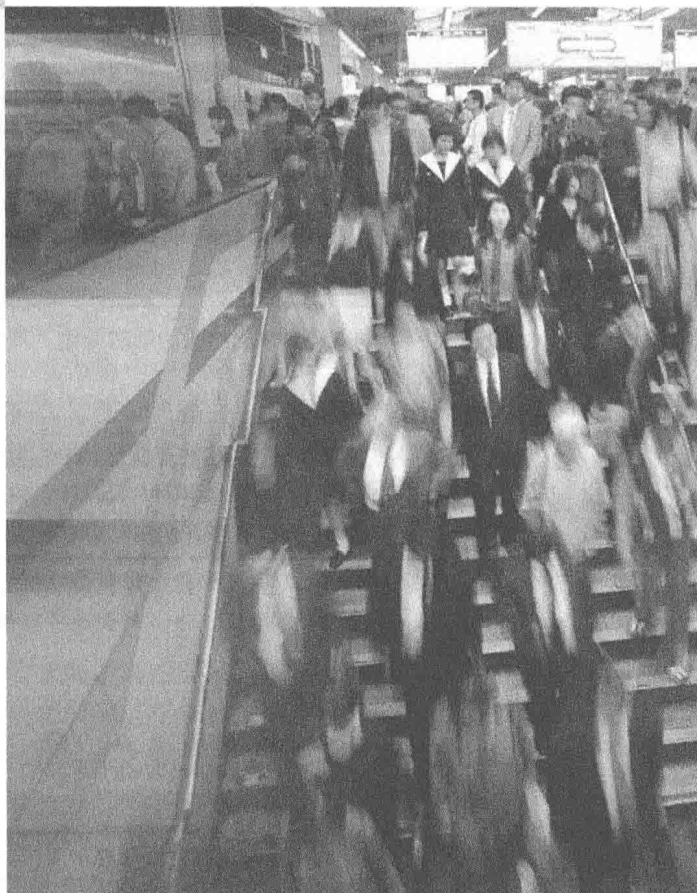
周均旭/著



 科学出版社

# 中国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

周均旭/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新常态下,中国要破解“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尴尬难局,东部沿海地区摆脱“低端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发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关键在于解决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矛盾。

本书采取从宏观到中观再微观的基本架构,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不均衡的劳动力“地理上的二元分布”原因,通过定性研究、实地调研分析了当前区际产业转移中劳动力的动态变化状况,提出扭转劳动力转移模式、克服劳动力外流与产业内迁矛盾的政策建议。

本书适合研究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以及劳动经济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 / 周均旭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03-047339-4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产业转移—研究—中国 ②劳动力—供求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F127 ②F249.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8362 号

责任编辑: 郭勇斌 曾小利 / 责任校对: 蒋 萍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1/2

字数: 272 000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际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跟踪研究”(10CJY004)成果,受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出版

#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赶上了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大潮，通过大量承接港澳台地区、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转移，中国得以融入全球产业链，获得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成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承接的产业多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加工贸易和中间投入品生产环节的日益强化可能导致中国陷于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同时，由于多年来对廉价劳动力过度依赖，劳动力收入的改善并不明显，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日益加剧。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先天要素禀赋优势，但是当前严重的“用工荒”与“就业难”两大问题并存的局面，反映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不匹配的矛盾，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各地区产业升级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研究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与变化趋势，以及它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对于中国发挥固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承接更多更高层次的产业转移，推动已有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获取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改善就业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书采取从宏观到中观再微观的基本架构，研究方法上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既有统计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也有实地调研的事例及案例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

第一，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和中国近年来在区际产业转移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沿着区位选择理论到区域分工理论，再到产业转移理论的发展脉络，对国外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回顾；对中国近年来区际产业转移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整体性剖析，揭示了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理论对国外产业转移理论的补充和贡献，也为本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对中国产业转移和劳动力供给的动态变化历程进行了总体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转移：政府主导的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三线地区的产业转移；市场主导的东南沿海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市场主导的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区际产业转移。当前产业转移的特点和新趋势包括：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持续增长，双向转移现象出现；产业转移的主体是制造业，但是国际服务业向中国转移开始加速；产业转移的来源地分布不断扩大，但

是主要来源地非常集中；国际产业转移流向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同时出现向中西部地区纵深扩散的趋势；区际产业转移发展后来居上，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也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当前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总量依然庞大，但增长速度趋缓；少子化和老龄化严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质量不断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结构改善；人口分布集中，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等。

第三，立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剖析了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在对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状况做出基本描述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选择出科学客观的劳动力结构测量方法，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中国劳动力数量与结构变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在整体上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及巨大的市场规模，对于 FDI 具有较强的吸引，但是解析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并不能吸引更多 FDI，而中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于吸引 FDI，推动经济转型与增长，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研究结论进一步揭示，中国中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提升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解除了人们对于中国廉价劳动力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 FDI 的担忧。

第四，针对中国 FDI 区域间极不均衡现象，选取省级截面数据，揭示了区域间劳动力结构差异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利用历史数据分析中国 FDI 和劳动力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情况，在全面总结归纳前人对劳动力结构及其对 FDI 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劳动力结构进一步按照价格、数量、质量和异质性四个维度分解，采用教育加权变异系数计算出劳动力异质系数，构建了一个劳动力供给结构对 FDI 区位选择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劳动力差异对 FDI 的影响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区域内部劳动力的异质性程度与 FDI 显现负相关性，即对于一个特定区域而言，其内部的劳动力如果在质量上同质性越强，供给结构差异越小，那么它对于 FDI 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揭示出，劳动力“地理上的二元分布”是造成 FDI 区位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并创造性地提出，通过采取措施，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引导同类集聚，可以减少区域内部的劳动力结构上的异质性，从而达到提升对与之匹配的特定 FDI 的吸引力的目的。

第五，针对当前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开始区际产业转移的现实情况，在中观层面研究了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状况及结构特点，分析其对于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作用与影响。中部地区人口密集，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大量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输出。面对当前大量沿海企业内迁导致的“用工荒”不断向内地蔓延的现象，采取统计数据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较深入的诊断研究，指出：中部地区在为外地输出了大量优质劳动力之时，本地农村富

余劳动力仍然有释放的空间，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充沛。中部地区劳动力供需矛盾实质上为结构性矛盾。在分析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状况及结构特点后，指出原因在于：一是承接产业转移过于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结构层次偏低，岗位存在着福利待遇低、工作压力大、人员流动速度快等特点；二是劳动力培训和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大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都输出到东南沿海地区。最后从劳动力供给、需求及市场三个角度提出了解决中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中面临的劳动力供需矛盾的较为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和建议。

第六，选取中部典型的中心城市——武汉城市圈和欠发达地区——大别山试验区两个案例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分析了在中心-外围模式下，中部地区的中心与外围作为劳动力的流入地和流出地，虽然在面对产业转移时都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双重矛盾，但是通过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诊断发现，武汉城市圈的中心城市——武汉市对于省内就近转移的劳动力有足够的吸引力，并不存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供给不足，主要问题是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转移需求的错位导致低端和高端“两端短缺”：武汉市自身教育结构高于产业需求，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完全依赖于外部流入；另一端则是，大量高端人才向东南沿海地区外流，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又以需求基本饱和的通用型人才为主，真正本地企业急需的高端人才匮乏。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劳动力培养模式是主要解决方法。而像大别山试验区中黄冈这样的欠发达城市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劳动力严重流失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区际产业转移，而相应的劳动力回流却十分滞后，出现内地与沿海同时争抢劳动力的状况。因此，只有扭转劳动力转移模式，才能克服劳动力外流与产业内迁的矛盾。

周均旭

2015年9月于广西南宁

# 目 录

## 前言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4
第三节 本书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9
第四节 本书内容与结构安排 .....	21
第五节 创新点 .....	22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24
第一节 产业转移理论 .....	24
第二节 劳动力供给理论 .....	35
第二章 中国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的动态变化历程 .....	49
第一节 中国产业转移的历程与趋势 .....	49
第二节 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与特点 .....	66
第三章 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	
——基于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 .....	79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79
第二节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80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8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91
第四章 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二)	
——基于区际劳动力结构差异的实证 .....	94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94
第二节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96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99
第四节 研究拓展 .....	10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103



<b>第五章 区际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跟踪研究（一）</b>	
<b>——基于中部地区的分析</b> .....	106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06
第二节 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变化与特点 .....	107
第三节 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状况 .....	114
第四节 中部地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的矛盾分析 .....	11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122
<b>第六章 区际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跟踪研究（二）</b>	
<b>——武汉城市圈的案例分析</b> .....	128
第一节 研究背景介绍 .....	128
第二节 武汉城市圈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变化趋势 .....	133
第三节 武汉城市圈产业转移情况与成就 .....	141
第四节 武汉城市圈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矛盾分析 .....	146
第五节 政策建议 .....	151
<b>第七章 区际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跟踪研究（三）</b>	
<b>——大别山试验区的案例分析</b> .....	159
第一节 研究背景介绍 .....	159
第二节 大别山试验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与成效 .....	160
第三节 大别山试验区劳动力转移情况 .....	165
第四节 大别山试验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的矛盾分析 .....	167
第五节 政策建议 .....	173
<b>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b> .....	179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179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183
<b>参考文献</b> .....	185
<b>后记</b> .....	203

# 绪 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一、世界产业转移的基本历程

产业转移是指某个特定的产业，由于原来所在区域的资源供给、产品需求等条件发生变化，而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转移也是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国家或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已经和正在经历四次大的产业转移，具体如下。

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之后，美国为了将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快速转到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精密机械及航天等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动将钢铁、纺织等传统的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亟待重整经济的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国家。而日本和联邦德国则通过这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承接了大量美国转移的钢铁等产业，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战后二三十年内重新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据统计，1950~1959 年，日本引进的外国新技术达 2332 件，其中最新的机械设备占比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是：美国作为这一次国际性产业转移的推动者，不仅顺利地完成产业调整，提升了自己的产业结构，凭借其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而且带动了日德经济的快速恢复，联邦德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日本也成为了东亚地区经济起飞的“雁首”。

第二次产业转移出现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等为了集中力量发展汽车、集成电路、精密机械和家用电器等新兴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传统的附加值较低的钢铁、造船、化工、纺织服装等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亚洲四小龙”转移。特别是日本，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在日元汇率不断升值的背景下，

选择了采取积极对外投资的举措，走上了国际产业转移道路，成为主要转出国：60年代开始将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国内则重点发展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又再次将钢铁、化工和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提升了日本的产业结构，更带动了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

第三次产业转移大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深入，信息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为了充分发挥其在新技术、新产品领域的创新优势，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产品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同时“亚洲四小龙”也为了大力承接和发展自身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大陆和一些东盟国家转移。产业转出地不仅有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有“亚洲四小龙”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而产业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大陆，以及东盟国家。日本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对外进行国际转移的产业，也不再局限于完全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展到包括汽车、家电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亚洲四小龙”经历了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生产能力扩张和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很快遭遇到自身市场狭小、生产要素及资源环境有限的瓶颈，不得不将这些产业转移到菲律宾等国及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借助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和市场潜力巨大等优势，吸引了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大量投资，积极地承接了国际制造业的转移，中国大陆成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

第四次大的产业转移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大幅削减，而国际产业转移也围绕着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新的产业革命，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进入一个新时期。首先，美国、日本，以及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先后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引导高端制造业回流。其次，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区和欧盟区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迅速发展，区域内部的产业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推动了区内产业转移的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同时，中国的区际产业转移大规模出现，东南沿海企业在迅速飙升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土地等资源成本的挤压下，利润空间严重压缩，部分企业走上从中低端制造业往高端发展的产业升级道路，而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开始向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第四次产业转移刚刚兴

起，全球成熟加工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进一步转移的趋势得到强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了主要的产业转出地，而中国中西部地区、东盟的欠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了产业承接地。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好赶上了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大潮，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大规模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使中国吸引到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稳固保持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的位置，2010年实际吸收外资金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大陆通过大量承接港澳台地区、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及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融入全球价值链，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的占比上升到15.6%，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产业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过度依赖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利用型产业，也带来了能源、资源、环境的巨大损耗，传统的加工贸易和中间投入品生产环节的日益强化可能将引致中国陷于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同时，“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也结束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

## 二、中国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供给研究的意义

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创造了“世界工厂”的奇迹，但是在过去多年的发展中，中国自身并没有获得太多切实的经济收益。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务工的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长期在600元左右的低位徘徊，12年里仅增长了68元（程刚等，2004）。2004年以后，由于“民工荒”的大面积出现，各地农民工工资大幅提升，但是据2011年中国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年会的数据，1978~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年增长幅度高达10%，而扣除物价上涨因素，32年来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了2.4倍。《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2）》也指出，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经济增长对出口和外商投资的过度依赖，并且劳动者权益在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等诸多原因，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占GDP的份额始终稳定在低水平上，甚至出现实质性的下降，这种“非典型”状况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的上升完全背离（王延中，2012）。

在近年来的产业转移与升级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中劳动力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刘易斯拐点”结束了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东南

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率先出现大面积“民工荒”。2008年以后，中国面临的第四次产业转移，转移方式更加多样化，转移地区也极不平衡，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顺应区域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比较优势变化情况，主动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承接更高层次的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区际产业转移<sup>①</sup>。在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中，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区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也大面积出现“用工荒”“招工难”。中国要摆脱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但“月薪8000元难解技工荒”<sup>②</sup>。与廉价劳动力数量上供不应求相对立的则是，人才市场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质量结构多年来不断改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高，但是，多年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却遭遇“就业难”。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对接的矛盾、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也成为制约中国各地区产业转移与升级的短板，如何协调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转移的矛盾成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市场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现象频繁发生，劳动力供给相对于产业转移更应看作是区域的先天要素禀赋，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对产业转移产生巨大吸引力。因此，研究劳动力结构特点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对于发挥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基本国情优势，吸引更高层次的产业转移，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另外，国外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产业转移，第四次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的崭新现象在于，中国这一新兴大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大规模的区际产业转移开始出现。本书从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角度针对中部地区进行了尝试性研究，也体现出一定的学术的前沿价值。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出现比较早，最初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区位选择、区域分工等现象开始研究，但由于劳动力供给充沛，在基本理论成型之初，

<sup>①</sup> 《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http://www.gov.cn/jwz/gk/2010-09/06/content\\_1696516.htm](http://www.gov.cn/jwz/gk/2010-09/06/content_1696516.htm), 2010-09-06.

<sup>②</sup> 姚有林. 月薪8000元为何难解“技工荒”. 新华每日电讯, 2009-10-18.

并没有对劳动力供给给予太多关注，更多研究集中在产业转移对劳动力的影响方面，成果比较丰富。

第一，产业转移对承接国的劳动就业会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从而大大增加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McKeon et al., 2004）。产业转移在承接地形成新的集聚，产业集聚必然吸引劳动力的集聚，这很早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马歇尔（1965）最早关注到产业集聚现象，并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角度做了解释，他认为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投入品，以及技术服务和知识的溢出，产业的集聚进而导致了专业人才的集聚，在区域内就容易生成一个供需畅通的专业劳动力市场。Perroux（1950）则提出增长极概念，增长极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增长极对周围地区资源的“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等都吸引着劳动力的流入，导致产业和劳动力的集聚。波特（2002）描述了产业集群的成长繁荣吸引有技术的工人和工程师涌入成功的企业中工作，指出就业机会是吸引优秀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同时产业集群的成功故事也会吸引最优秀人才的加入，并形象地描述为：“对于产业而言，地理集中性就好像一个磁场，会把高级人才和其它关键要素吸引进来。”Krugman（1991）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最初可能是由于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是一旦形成就必然产生内在的向心力以保持集聚动力和凝聚力，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较高的劳动报酬都对劳动力有巨大吸引力，劳动力供需畅通则可能是早期企业集聚的原因，而随后由于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效应，不断强化和壮大。Feldman 和 Audretsch（1999）发现产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就可以享受研发的溢出效应而提高利润，也能发挥优势吸引更多相关的产业资源、技术和人力资源，以及各种配套服务机构。

第二，产业转移也会提升承接地的劳动力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McKeon 等（2004）认为，就长期而言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力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培训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流动溢出效应——外来资本的竞争优势是无法完全脱离人力资源而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为保证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会从总部派遣专家指导工作，加强本地人力资源的培训，支持当地技术人员参与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甚至研发活动等，这种培训效应加强了对当地人力资源的培训，提升了区域人力资源水平，并且经培训的人力资源流入当地企业，也会提高当地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Gershenberg, 1987；Blomström, 1986）。跨国公司还通过示范效应加速当地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迫使当地同行企业及关联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管理手段，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加大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力度，以与其竞争或为其配套及服务（Kokko, 1994）。产业

转移还会带来稳定的巨大的产出和赋税贡献，跨国公司设立的教育基金和奖助学金等支持东道国正规教育的发展，改善东道国的教育培训制度和环境、劳动力市场制度与运行机制，并逐步实现与国际水平的接轨（Haskel et al., 2001; Miyamoto, 2003）。另外，产业转移带来了大量专业化人才在产业承接区内集聚，非常容易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沟通网络，方便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以及技能和知识的积累与共享，降低信息搜索成本，提高产业创新速度，推动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人才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个人必须加强学习交流和创新活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Barro et al., 2001）。

第三，产业转移对劳动力价格也产生影响。Haskel 和 Slaughter（2001）、Almeida（2007）认为，外资进入后，存在工资溢出效应和工资差距效应：通过转让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对东道国企业进行收购或投资等方式，加剧了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以及人才、技术的流动性，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改变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提升了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工资水平，并逐渐缩小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工资差异。而 Martins（2004）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葡萄牙国内企业工资水平产生正面影响，影响弹性为 2%~3%。Feenstra 和 Hanson（1997）对墨西哥、Figlio 和 Blonigen（2000）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Lipsev 和 Sjolholm（2001）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Bedi 和 Cieslik（2002）对波兰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结论。但是，Faggio 和 Knoings（2003）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波兰本土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而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影响却为负。Figini（2011）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资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前者存在工资溢出效应，带动整体性工资水平的上升，但是对于后者只会缩小工资差距，降低工资不平等。Aitken、Harrison 和 Lipsey（1996）曾深入行业进行分析，发现：在墨西哥，外资虽然提高了当地的平均工资，但是只发生在与其相关的部门，而对其他内资部门没有外溢效应。Blomström 等（1992）也认为工资溢出效应仅发生在与外资部门展开充分竞争的特定内资部门。Wood（1998）认为，外商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无疑地增加了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其工资水平。但是 Driffield（2001）、Gopinath 和 Chen（2003）、Basu 和 Guariglia（2007）等的研究却发现，国际产业转移虽然提升了承接国整体的平均工资水平，但是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却被技术外溢扩大了。Veld 和 Morrissey（2004）在对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菲律宾和泰国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总量效应方面，同时提高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但是在结构效应方面，却加剧泰国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其他方面的争议也相当多，如 Robbins（1996）、Velde 和 Morrissey（2002）实证研究还表明，外商投资对东亚和拉丁美洲等不同国家工资差距的影

响也不完全相同。Egger 和 Stehrer (2003) 甚至意外地发现, 外商投资的增加导致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总额都显著下降,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跨国公司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 研究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则需要将特定地区的劳动力作为先天要素禀赋。Lewis (1954) 基于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 他关注到 20 世纪 60 年代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出现非熟练劳动力供给严重短缺, 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因此不得不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丰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 而改由发展中国家进口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Bagchi-Sen 和 Wheeler (1989) 论证了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资本零售率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美国的区域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Krugman (1991) 认为劳动力的集聚是吸引产业转移和集聚的重要向心力, 劳动力的可移动性也是决定产业空间集聚和转移的关键因素。Krugman 和 Obsfeld (1994) 也强调资本流动的方向和数量更多由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决定, 而劳动力是其中的主要因素。Friedman 等 (1996) 也认为市场潜力、工资、每单位资本拥有的熟练劳动力、科学家和工程师总量等因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非常重要。Shailey (2006) 指出一国在吸引产业转移时, 人力资本优势取决于该国高技能劳动力的绝对数量, 而不是其相对比重, 如中国和印度虽然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不高, 但是绝对数量巨大, 并且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相对较低, 从而吸引了大量美国企业的外包服务。以上研究都关注到不同国家或区域,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数量优势对于承接产业转移的作用, 人口、高技能劳动力的绝对数量, 甚至人口增长率对外商直接投资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劳动力供给在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对产业转移也会产生影响, 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因素。Dunning (1980) 指出, 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 劳动力的技能和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外资流入的规模, 而且影响其对技术水平的选择。Lucas (1988) 指出, 人力资本存量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力资本的差异, 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质量低下制约了外资的流入。Noorbakhsh 等 (2001) 分析了大量发展中国家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的数据发现, 无论是人力资本存量, 还是流量,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都有积极显著的作用,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国家获得的外资也越多;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 提高本地劳动力供给的质量水平, 可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Miyamoto (2003) 在研究中指出,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国际产业转移更趋向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外商投资更加看中劳动力的素质, 对低成本、低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 因此, 东



道国的劳动力质量将直接决定外资流入的规模和技术水平。Barro 和 Lee (2001)、Borensztein 等 (1999)、Kottaridi 和 Stengos (2010) 等都认为,劳动力的质量水平与结构对产业转移的规模、结构、扩散存在显著影响,能够带来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的产业转移往往要求东道国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只有拥有一定人力资源基础的地区或国家才能够顺利进行产业承接,并利用现代技术保持收敛趋势。Blomstrom 和 Kokko (2002) 认为,东道国的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复杂的、非线性的作用:人力资本水平高可能获得更多的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相反,劳动力质量低下只能吸引少量的技术简单的外商投资。Chuang 和 Lin (1999)、Driffield (2001)、Tardivo 和 Viassone (2009) 等对英国、希腊、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波兰、意大利等的统计分析,以及 Nunnenkamp 和 Spatz (2002) 对 28 个发展中国家,UNCTAD (2002) 对 140 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同样得出:本地劳动力的质量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导因素;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所获得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流入量多并且技术含量高,熟练劳动力对产业区位起到决定性作用,且不断增强。

但是,劳动力质量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例如, Schneider 和 Frey (1985) 分析 54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仅有一个年龄段中学教育的比例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微弱的影响。Blomström (1986) 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简单劳动技术的行业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没有明显的相互关系。而 Root 和 Ahmed (1979) 研究了 58 个发展中国家,发现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识字率、入学率、专业技术工人数量,都与外商直接投资无显著影响。Khawar (2005) 利用截面数据对 59 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转移与国内投资、人力资本、初始 GDP、人口及政府政策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产业转移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源状况存在着显著的相互关系。Hanson (1996) 对 105 个国家的研究认为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没有影响。甚至 Wasseem (2010) 对 1980~2002 年的海湾合作会议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国家的分析显示出,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质量之间存在反向的联系。

除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之外,劳动力的价格也是被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因素。韦伯 (1997) 在《工业区位论》中指出,工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力量是运费、工资和集聚三者作用下的最小生产成本,廉价的劳动力可能导致工业区位的变化,并提出劳动成本指数的概念以衡量工业企业受廉价劳动力区位吸引的程度。Wheeler 和 Mody (1992)、Campos 和 Kinoshita (2003)、Swenson (2004)、Bevana 等 (2004) 利用大量转型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都得出结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工资水平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Mody 和 Srinivasan (1998) 针对美国和日本的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